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主 编 焦垣生 张 蓉
副主编 杨 琳 李 慧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焦垣生,张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

(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

ISBN 7-301-06326-1

.中... . 焦... 张... .古典小说-文学欣赏-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439 号

书 名: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著作责任者:焦垣生 张蓉 主编

策 划 编 辑:杨书澜

责 任 编 辑:李廷华 舒岚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6326-1/ I · 0631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 印张 28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很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人生价值有所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只能像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爱因斯坦



总 序

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精神是特别重视的。我国古老的经典《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已经非常注重对人的的人文精神的教化了。所谓人文教化就是用人文精神来教育人。那么，人文精神从何而来呢？照《周易》看，它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人文精神教化的经验，例如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修养德行；不讲究学习；听到符合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有了过错而不能改正，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孔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很好的总结。我们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我想，就是要讲道德，讲学习，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虽能造福人类社会，但也可能严重地损害人类社会。今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科技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造福人类的；那么，我们如何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就是要用人文精神来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孔子说的，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修德”并不容易，那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对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要天天提高自己，而且要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不断前进。“向善”是

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做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只有做到这些,科学技术才不会脱离为人服务的根本目的,走到邪路上去。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需要用人文精神来加以引导。

在当今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竞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我们的国家要坚强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取之有道”,也就是说做生意、赚钱应该合乎道义。可是面对我们国家的现实,有些人往往为了赚钱,取得高额利润,见利忘义,不顾及社会福祉,不讲信义,甚至做出坑害人民的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除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外,最主要的就是缺少一种可贵的关怀人的精神,缺乏关怀人的精神的教育。我们做一切事都应“以人为本”。为什么要发展经济?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离开这一点,发展、赚钱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发展经济应“以人为本”,那么,在我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就应处处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这就需要有一种关怀人的人文精神,并对全社会进行关怀人的教育。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一套《普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通用教材》,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大学生是建设富强、繁荣的中国的生力军,我们国家未来的健康、合理地发展就要靠这批大学生,因此,使他们受到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尤其必要。我们的大学生当然要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要担当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但千万不要忘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首先应关怀人,关怀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做一个有理想,讲道德,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有人文关怀的人。我相信这套教材一定能在大学生成长的人生道路上起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目 录

中国古典小说史略	()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方法	()

上编 短篇小说

三王墓	()
白水素女	()
王子猷雪夜访戴	()
管宁华歆割席	()
王恺石崇争豪	()
霍小玉传	()
枕中记	()
虬髯客传	()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节选)	()
崔待诏生死冤家(节选)	()
玉堂春落难逢夫(节选)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节选)	()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节选)	()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节选)	()
翠翠传	()
娇娜	()
婴宁(节选)	()
罗刹海市(节选)	()
王子安	()
席方平	()
交河乡民妻	()

下编 长篇小说

三国志通俗演义(存目)	()
西游记(存目)	()
金瓶梅(存目)	()
水浒传(存目)	()
儒林外史(存目)	()
红楼梦(存目)	()
官场现形记(存目)	()
后记	()

中国古典小说史略

小说,作为严格的文体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一个词语,“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干是求的意思,“县”通“悬”,是高的意思,“令”是声誉。意为修饰琐屑的言辞以求取高誉,离开通晓大道的境界就太远了。可见这里的小说,是指那些无关大道宏旨,亦不可经世致用的“琐屑之言”,与今人所谓小说相去甚远。汉代,小说作为一种明确的文体概念,被提了出来。先是东汉荀悦撰写《汉记》中引西汉刘向父子《七略》的话:“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后来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至此,“小说”成为一种文体,擅长此体的人被称为“小说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列九流十家,小说家作为一派列于末位。班固指出,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也就是说,小说本是街谈巷议,由稗官采集记录并加以整理而成。班固没有明确地指出小说的形式,但他列举了15家小说的篇名并作了小注,内容非常广泛、庞杂,具有文史不分的特征,至今大多都已散佚了。班固以后,小说被认为是一种文体的名称,其所指范围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扩大。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史书与小说的根本不同即在于“实”、“虚”二字,他将小说分为10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其中“逸事”、“琐言”、“杂记”三类基本上概括了后世所谓志怪、志人类笔记小说的大体内容。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清代《四库全书》分小说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显然都受其影响。宋元以后,随着宋代说话艺术的

兴盛,“小说”成为说话艺术中最有影响的科目,进而被用来指称产生于说话艺术的白话小说。虽然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作为小说,它们在文学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到了晚清,域外小说纷纷地被翻译而涌入古老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思想家都撰有小说专论,他们所谓的“小说”已经是明确的文学概念。经过域外境内小说的双向推动,终于形成了现代的小说观念。

在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小说的地位总是处在主流意识以外的边缘地带。与诗歌的早熟相比,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成熟的时间晚,而且长期受到排斥、歧视和打击,在文坛边缘苦苦挣扎徘徊。明代以前,是争取生存的权利;明代以后,是争取被重视和文坛盟主的地位;直到近代西方文学传入后,才有彻底的改观。

从语体上说,中国小说又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宋代以前,只有文言小说,宋以后,文言、白话两大体系既各自独立平行地发展,又有交叉和相互渗透。文言小说的成熟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和章回小说。

一、神话史传:小说的源头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时期。虽然并没有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作品,但它为后世小说的诞生,提供了素材和养料,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和西方一样,中国小说也是滥觞于远古的神话传说的。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史学观念的发达,以及先秦理性主义精神旗帜的高扬,使得中国神话在流传和保存中大量散失。现在保存下来的神话作品多散布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天问》等有限的几部典籍中。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女娲补天”的故事描绘了上古时代的凄风苦雨景象,同时塑造了一位勇敢、聪明和善良的伟大女神和人类母亲

形象;共工怒触不周山打破了暴君颛顼的统治秩序,使宇宙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动,他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魔鬼撒旦,具有邪恶的叛逆精神;《穆天子传》中记述的周穆王驾八骏巡游天下,与西王母会面的故事开创了后世文学中人神恋爱情节模式和游仙模式的先河。马克思曾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转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国神话同样浇灌和哺育了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它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即使在几千年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依稀见到远古神话的影子。

其次是寓言故事。《孟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不少寓言故事,它们大多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而敷衍虚构出一个故事,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其中对现实的直接干预,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精巧的构思,丰富的想像,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拟人、状物、夸张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为后世小说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是史传。中国史传叙事文学相当发达,一方面小说作为史家的附属,其发展受到了限制,迟迟未能获得独立的文学地位;另一方面,成熟的史传文学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史学要求铁的事实,而文学却不离虚构和想像,二者泾渭分明。但在先秦两汉,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并不明显。《左传》擅长描写战争,其叙事技巧对后世描写战争的历史小说影响很大;《战国策》中不乏绘声绘色的叙事状人的文字,《荆轲刺秦王》一节,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极为成功;至于《史记》,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以著名的历史人物为中心,以历史斗争的广阔画面为背景,以人物的一生行踪、命运沉浮为线索,选择那些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细节琐事,加以渲染形容,采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这些特点与小说描写人物的特点是不谋而

合的。中国古代小说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人物一生始末的完整交代,喜欢抓住一个主人公,笔头紧跟住不放以求得集中而完整的形象,而很少采用从生活横断面切入的写法,对情节的高度重视,以及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这些都与纪传体历史著作的潜在影响有着深刻的联系。唐代传奇小说就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对小说的深刻影响。

除正史以外,特别是那些逸史,可谓小说题材的重要来源。原先在口头流传的神话,有的被采入正史,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山海经》里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三分像人,七分似妖,是男是女,无法判断。而在《穆天子传》里,西王母已经俨然一位人主。再到后世假托班固所撰的《汉武帝内传》里,西王母成了“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资掩蔼,容颜绝世”的美人了。由此可见人物演变的轨迹。《燕丹子》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已是一篇相对完整,初具梗概的小说作品,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第一篇小说。([明]胡应麟《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

二、志怪和志人:文言笔记小说的雏形

古代神话传说及史传故事都只是具备一些小说因素,或者说小说的前身,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兴起才真正粗具小说规模。

志怪小说以写神灵鬼怪及其妖异怪诞之事为主,志人小说以记载人物的琐闻逸事为主。

从艺术价值和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志怪小说要比志人小说更有价值,具备更多的小说要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指出其：“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近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朝廷更迭，兵燹连年，动乱使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一片混乱，精神道德土崩瓦解，举国上下，无不陷入生死荣辱变化无常的窘困境地。得道成仙或长生不老，消灾弭祸或求得解脱这种鬼神迷信和宗教虚幻观念，不论是对醉生梦死的统治者，还是对处在兵荒马乱之中，备受折磨煎熬的黎民百姓，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这种鬼神和宗教观念的流行，正是志怪小说得以滋生的温床。而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就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讲，经先秦两汉的长期孕育，一种新的文体——笔记体已经形成。这一文体取材随便，长短任意，记述便宜，一经出现，便成为志怪小说的主要形式。

志怪小说的题材来自神话、宗教故事、民间传说、历史上现实中的奇人异事、地理博物传说。志怪小说的作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人生经历。有王公大臣中书令张华（《博物志》）；有历史学家干宝（《搜神记》）；有道士王嘉（《拾遗记》）；有数学家祖冲之（《述异记》）等等。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影响最大。干宝在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少数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东海孝妇》、《董永》等，这些优美的故事一方面折射了时代的黑暗腐朽，抨击了统治阶级的专横跋扈及祸国殃民的罪行，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倾向，具有深广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艺术上也有成就，故事中那奇特的想像，善于通过对话和动作来表现人物性格，细节的渲染和场面的描写，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观赏价值。但从总体上来看，与后世的

小说相比,志怪小说还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但志怪为后世的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丰富的想像。唐传奇直接继承了志怪的传统,表现出对奇人异事的浓烈兴趣。宋人洪迈的《夷坚记》、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均属于志怪。

汉代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制度,注重乡评里选,因而社会上形成了品评人物的风气。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风度雅量。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百倍。有人把这类事记录下来,集成书帙,流行于世。如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这就是所谓的志人小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这类书的代表。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的真实面貌与生活情景。如不拘礼法,举止放诞任性的王子猷;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大度宽宏的谢安与顾雍;标榜清高雅致,追求清谈玄远的文人雅士。同时还暴露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对统治阶级和豪门世族的贪婪残暴、穷奢极欲和吝啬狠毒给予了不遗余力的谴责和抨击。如王恺与石崇斗富夸豪,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世说新语》刻画人的个性达到了形神兼备、描骨如神的地步。善于选择简单典型的场面,画龙点睛般地勾勒出一个人独具的性情,往往通过寥寥数语,就写出一个人的音容笑貌,令读者过目不忘,为后世小说的写人提供了楷模。

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多是一些粗陈故事梗概,常常缺乏完整的情节,更谈不上人物性格的刻画,所以只能算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还不是成熟的作品。同时,志怪小说的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是把奇人异事当事实一样记录下来,还没有脱离史传的“实录”,相信凡是作者所写的,皆是现实所存在的,即使是那些神怪灵异,也是“阴阳殊途,人鬼乃皆实有”。因此,作者在记述鬼神怪异与记载人间情事时,“自视固无诚妄之别”,不大作“幻设语”,因而缺乏文学的虚构和渲染,从根本上说,还不是“有意为小说”,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在创作题材方面,还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

三、唐传奇:文言小说的成熟

“传奇”之名,最初一为元稹《莺莺传》的原名(见周绍良《传奇笺证》),一为晚唐裴铏小说集《传奇》。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在传奇类后列举《飞燕》、《太真》《莺莺》、《霍玉》等,并称:“《飞燕》,传奇之首也。”以后,传奇作为唐代文言小说的通称,便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唐传奇无论是内容的丰富性,题材的多样性,人物的形象性,故事的艺术性和文笔的生动性诸等方面,都是六朝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唐代传奇小说,承六朝志怪志人小说余绪发展而来。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和神异题材与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一脉相承,但最大差别是洗去了其神话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消遣娱乐的印记。唐传奇脱胎于史传文学,但又摆脱了实录传统即真人真事的局限,有了较多的艺术虚构。在内容题材上,多取材于广阔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不似志怪志人小说那么狭窄。作家阵容庞大,多为一时之名士,如元稹、白行简、段成式等,把小说当作诗歌一样的文学作品,而加以刻意创作。“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以,鲁迅先生高度评价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比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唐传奇的成熟,除了史传文学与志怪志人小说的影响外,还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随着大众审美趣味的由雅而俗,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而传奇所传述的奇闻轶事,正投合了文人和市民阶层嗜奇猎艳和谴兴娱乐的审美需要和期待视野;其次,与唐代科举考试的“行卷”风气也有关系。因为传奇以叙事为主,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又多缀有议论,“文备众体”,可以显示作者多方面的才能,故传奇也常用作“行卷”、“温卷”,不仅可以在考试前投给有关官员,就是在一般的社交场合,作为一种高雅的消遣活动,也是很时髦的;第三,经过“安史之乱”,那种充满激情、自信和进取的浪漫主义的“盛唐

气象”已经衰微,文人士大夫对社会人生都不再那么抱有期望,他们的心灵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寻求寄托。而传奇小说正好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世界,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幻想人生,建构人生,实现在现实世界中所有不能实现的愿望。

唐传奇经历了三个阶段:初、盛唐为发轫期,作品数量少,艺术表现上也不够成熟,王度的《古镜记》是唐人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将作者戏剧化之后进行叙述的第一人称“记”体传奇小说;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的主要贡献是用史传小说的艺术形式叙写志怪内容,有波澜,有高潮,布局严谨而文字优美,形象生动而叙述委曲,开“传”体传奇小说之先河;张《游仙窟》在中国久佚,文学史上影响不大,但在当时就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学影响颇大。它是第一篇以第一人称直接写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爱情的小说,极力渲染男女情爱,色情成分极浓,近开唐传奇垂青爱情题材的先河,远露后世性爱小说的先声。

中唐是传奇发展的兴盛期。名家名作鹊起,唐传奇的优秀篇目大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沈既济的《任氏传》清楚地展现出鼎盛时期传奇小说在题材上由志怪向现实、由述奇向爱情转换,在风格上由单纯叙事向叙事与抒情、议论相结合演进的趋势。到许尧佐的《柳氏传》写韩翃与柳氏的悲欢离合,已经丝毫不带志怪色彩了。从德宗贞元十五年至宪宗元和五年这十年间,是唐传奇最为鼎盛的时期。内容多写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爱情,作家多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集团的成员或受其影响的文人。他们往往以同一内容为题材,既写传奇小说,又写长篇歌行,如元稹的《莺莺传》与李绅的《莺莺诗》、白行简的《李娃传》与元稹的《李娃行》、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等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但促进了传奇的创作,也扩大了传奇的影响。蒋防的《霍小玉传》在传奇小说中首先冲破《莺莺传》维护纲常、以薄情为“善补过”的思想局限,成功地塑造了李益这一薄情郎形象,后世戏曲小说,所写“痴心女子薄情汉”,可谓受其影响;同时增加了霍小玉鬼魂报复李益的尾声,以代替议论,使主旨更加明确;增加了“黄衫客”这一武侠形象,显示了唐传奇题材的变化,为中国小说史上爱情与武侠合流的

滥觞。

晚唐为退潮期,最令人注目的是传奇专集的大量出现,如裴铏的《传奇》,薛用弱的《集异记》、李复言的《续玄怪录》、郑还古的《博异志》、陆勋的《集异记》、康骈的《剧谈录》等。从题材内容方面讲,反映现实和爱情的作品明显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志怪与侠义题材的勃兴,出现了一批描写豪侠之士及其行为的传奇作品,如《虬髯客传》等。这些小说集,在编撰方面以传奇小说为主,杂采笔记小说入集,从而克服了文体单一、缺乏变化的缺陷。后世的《夷坚志》、《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集,从总体艺术形式方面,显然更多地受到唐传奇集的影响。

唐传奇从内容来看,不外乎三类,即神怪、爱情和豪侠。其中以爱情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像《任氏传》、《柳毅传》都是写人神恋爱故事,大大超越了志怪小说中人神恋爱的意念和情感模式,不再以慕仙和艳遇及其借以表达寒门士子攀附显赫门第的潜意识欲望为主旨,而是表达出对人间真情的热烈追求和呼唤。至于那些直接写现实生活中爱情的作品,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不论是写未婚男女的偷偷恋爱,还是写不合理婚姻中女子的婚外恋以及妓女对真情的追求,都将爱情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多种角度、层次和侧面写出了爱情的缠绵、甜蜜、悲苦和哀艳,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与律诗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凡例》)

善于借助虚构来营造真切感人的情境,是唐传奇艺术上的一个特点。唐传奇在叙述方式上一方面借鉴了史传的客观记事记言的呈现方式,明确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标注年号,故意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真实感觉,另一方面又打破了一般史书遵照自然时序叙述的方法,相当多的作品采用了倒叙、插叙等艺术手法,大量使用虚构想像以求奇,细节描写以求真,在真假实幻之间,创造出情韵盎然、文采斐然的艺术品来。

巧妙的构思,完整的结构,曲折的情节,是唐传奇的又一个艺术特点。如《柳毅传》,柳毅激于义愤,为不堪虐待的龙女传书求救,钱塘君怒杀泾河逆龙,救回龙女,柳毅使命完成,准备离开龙

宫,故事似已完结。突然枝节横生,钱塘君逼婚,波澜再起,柳毅拒婚,回家后连娶三妻,似乎与龙女已断,谁知,前两妻均夭折,最后所娶的卢氏,竟是龙女。故事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

唐传奇在语言、辞采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由于唐传奇的作者大都诗文兼长,讲究遣辞造句,在运用书面语的同时,注意汲取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的口语,形成生动、流畅、凝练的风格。如《李娃传》中的对歌,《霍小玉传》中小玉与李益诀别,都是非常精彩的片段。

传奇小说在唐代,虽然是文坛奇葩,但与唐代文坛成就之盛相比,仍属于文人的游戏笔墨,终不为正统文坛所重视。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戏曲。唐传奇的题材,多为后世戏曲所采用。如元稹的《莺莺传》,就变为王实甫的《西厢记》;沈既济的《枕中记》,变为元代马致远的《黄粱梦》,再演变成明代汤显祖的《邯郸梦》;陈鸿的《长恨歌传》,演变为清代洪升的《长生殿》等等。其他也多为后代戏曲所取材,于是,传奇内容变为民间戏曲流行的故事了,这种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晚唐以后,传奇走向通俗化,由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民众渗透,宋传奇承继了晚唐余绪,作品多寓劝诫,传奇小说的观念逐渐下移,多写宫闱艳情和小儿女私情,有媚俗之意。

现存的大部分唐传奇作品都收在宋初李 编纂的《太平广记》一书里。

四、宋元话本:白话小说步入文学殿堂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之前,是文言小说单线发展,之后,是以白话为主,文言、白话双线发展。不仅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也使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分量越来越重。

“话本”即说书艺人演出的底本。因为说书艺人只能以当时流行的口语演说,所以作为文字记录的话本多用俚语写成,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这种白话小说一出现,就以其通俗性、生动性和远超出